巴尼时代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欧盟四国技能形成模式比较研究

修 南
（辽宁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在技能社会积极应对“巴尼时代”社会变革，重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其走向技能社会转型进程中，技能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技能形成作为技能社会的社会化过程，主要存在集体主义、分隔主义、国家主义和市场主义四种模式。依据构建的主体权责、制度设计和社会后果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丹麦、波兰、法国和爱尔兰的四国技能形成模式的历史演变，可发现这四种模式呈现出不同特点与社会后果。然而，在“巴尼时代”，不同技能形成模式展现出相同趋势，即均通过构建国家适度管控的技能形成新型生态格局，塑造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技能供给长效机制，健全国家本位政策导向的技能形成制度设计，营造以尊崇技能为核心要义的技能文化体系等途径，推动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在于，可通过强化政府统筹与适度管控，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完善成本分担、社会保障及资格认证等制度，培育尊崇技能文化氛围等路径，重构“巴尼时代”技能社会的结构与秩序，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关键词］巴尼时代；技能社会；职业教育；技能形成模式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25)08-0059-20
DOI:10.20250/j.sfe.2025.08.004

随着后工业化、数字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度演进，新兴风险不断涌现，难以预料的危机将不确定性社会推向“混沌”，“乌卡时代”（VUCA）的结构范式面临失效，新的“不确定性复合体”（uncertainty complex）正在出现。美国未来学家贾迈斯·卡西欧（Jamais Cascio）用“巴尼”（BANI）来描述现代社会及经济环境中的混乱与不稳定，构建了由脆弱（Brittle）、焦虑（Anxious）、非线性（Nonlinear）、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ble）等组成的框架，[1]试图通过“增强韧性以反脆弱，守住正念以抗焦虑，激发潜能以破瓶颈，掌握真知以利创新”[2]等应对之策，为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结构范式。那么，技能社会如何回应社会变化，重构职业教育体系，使之从文凭社会转向技能社会，成为职业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转型升级与职业教育供给研究”（课题编号：24YJC880152）。

［作者简介］修 南，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教育学博士。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教育要回答的时代命题。解析欧盟国家技能形成模式，能够帮助中国在这个持续震荡的时代找出恰当的方案，进而为其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提供经验。

一、巴尼时代的技能社会透视

“当今世界，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治理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将世界历史推到了又一个重大转折点”。[3]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渗透至个体层面。崩溃、不安、失衡与模糊，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在外部复杂环境与内部沉重压力的双重夹逼之下，文凭社会原有的稳定性、系统性和可预测性逐渐消解，技能主体性也在频繁更迭的范式中摇摆不定。基于此，需要对技能社会展开全新审视，以更好地把握其在“巴尼时代”的发展脉络与方向。

（一）技能本质的回归与教育功能重构

从能力结构视角描述社会特征，技能社会侧重于通过教育的分流功能呈现人力资源状况，而文凭社会则侧重于借助教育的分层功能。在技能社会与文凭社会基于不同教育功能呈现出的显著差异背景下，技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实际上，“技能是一种个体能力，同时还带有强烈的社会公共品色彩：它既是劳动者谋生的工具，也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既是劳动者社会地位获得的载体，也是国家竞争优势达成的核心要素之一。”[4]从定义可以看出技能在经济社会运行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在资本逻辑影响下，依附于劳动者身上的技能也开始趋向商品化，劳动者往往需要某些合法机构的信用承诺（如颁发证书等），才能获得进入社会的“入场券”。当下，突出回归技能本质——构建技能社会，目的是通过发挥教育分流功能，将相当一部分人口导向技能工作。[5]然而，现实是，随着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张及层类调整，“文凭通货膨胀”现象依旧存在，说明技能社会和文凭社会所对应的教育分流与分层功能并非单独发挥作用。文凭仍是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及衡量技能的替代物。所以，在思考技能与文凭的关系时，首要问题是技能能否用文凭来衡量？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深入剖析教育与社会分层现象后指出，特定职业所需要的技能训练，更多源自实际工作经验，而非正式学校教育，即便职业学校，其向外展现的核心价值在于文凭而非学生掌握的技能。[6]由此可见，学校背后的文凭价值，在劳动力市场的筛选制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教育投资回报率视角看，克里斯蒂安·格鲁塔特（Christiaan Grootaert）对科特迪瓦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职业教育与培训投资回报率低于初等和中等教育；[7]保罗·本内尔（Paul Bennell）等人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投资收益低且受多种因素制约；[8]西蒙·麦格拉斯（Simon McGrath）等人强调，没有普遍适用的技能可以让学生在学校所学能无缝对接工作岗位需求。[9]这些研究表明，技能形成是贯穿终身、复杂且动态的过程，以文凭表征技能存在局限性，反映了资源分配不平等下社会的无奈选择。那么，在“巴尼时代”，这种矛盾会愈发凸显，迫切需要打破文凭社会迷思，回归技能本质，重新定义职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业教育的功能及作用。

（二）技能文化生成：职业教育的韧性构建

构建技能社会需要突破文凭社会的重重桎梏。然而，当取消文凭对技能的标准化认证这一长期的“稳定器”，在迈向技能社会进程中，社会结构样态必将面临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不可避免地呈现不稳定性，充斥着动荡与陌生感。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诸如技术迭代、经济格局调整，不再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而是会渗透至劳动者个体的内心深处，引发一系列心理层面的链式反应，进而引发劳动者群体的脆弱与焦虑，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

当前，技能人才短缺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面临的挑战。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数以千万计的技能岗位空缺，需要具备尖端数字技能的人才前来填补，然而符合要求的劳动者却极为稀缺。其中，中国的技能人才缺口高达750万人，欧洲存在50万的职位空缺。”[10]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同样指出：“在信息和通信产业领域，技能人才缺口较大，德国、泰国、印度分别面临着12.4万人、45万人、14万人的技能空缺。”[11]尽管世界各国已通过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出台优惠政策吸引人才等举措，但全球技能岗位的空缺率依旧严峻。大量有意愿投身技能工作的劳动者未能就业，凸显了在当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下，技能人才供需鸿沟及加快技能文化生成的紧迫性。因此，提升劳动者技能水平，优化技能人才培养与供给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的韧性构建，是确保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前提。

劳动者逃避技能工作，与对技能本质观念的认识未能彻底改变、缺乏技能文化认同、技能培训体系不完善、技能工作社会地位与待遇不匹配等因素有关。在“巴尼时代”，韧性（resilience）被视为应对外界环境变化、处理内心焦虑与不安的有效范式。布莱恩·沃克（Brian Walker）等人的研究表明，韧性包括阈值（Latitude）、抗性 Resistance）、不稳定性（Precariousness）和扰沌（Panarchy）四个要素，指向系统如何应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受到风险冲击的恢复力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可持续力三种属性。[12]而赋予职业教育以韧性，促进技能文化生成，是劳动者走出文凭社会的最优选择，也是实现劳动者行动与思维重构的关键，这需要职业教育在成本分担、社会保障、资格认证等多方面进行调整。

二、技能形成：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类型划分及分析框架

技能社会是在“巴尼时代”下提出的、区别于文凭社会的新社会形态，它是技能形成体系的社会化过程，[13]其核心是通过技能形成体系的社会化建构，重塑人与技能、人与社会、技能与社会的关系。[14]技能形成作为国家与政府构建技能社会的制度化手段，有着重要作用。它旨在通过特定方式维稳外部环境，借助技能文化塑造个体内部的社会认同，进而增强面对不确定性复合体时的韧性。这种作用制度使得技能形成对技能社会职业教育体系的结构与秩序构建极为关键，同时也使其成为国家与政府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决策层及企业、工会等参与层理解技能社会的重要视角。基于此，本文聚焦技能形成的类型划分及其核心议题，以期为职业教育参与技能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参照。

（一）技能形成模式的类型划分与研究对象选择

技能形成过程错综复杂。不同的政治制度不仅决定了政府在职业教育中肩负的责任，还影响着产业关系内外部各主体间的利益分配制度，对技能形成产生重要影响。[15]英国学者大卫·阿什顿（David Ashton）等指出，政府机构、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雇主及工会等主体的权力博弈塑造了差异化的技能形成制度环境。[16]《牛津技能与培训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Skills and Training*）基于不同技能形成划分标准，从多个维度对技能形成模式进行了定义：一是基于社会分层理论（Sociological Stratification Theories），按教育层次及标准化程度，可以划分为高技能形成模式和低技能形成模式，分别以德国和英国为典型代表；二是基于民族学习文化（Differing National Learning Cultures），自欧洲手工业与同业工会模式式微后，出现了法国国家官僚主义、德国双元制、英国自由市场经济等类型的技能形成模式；三是在制度主义分割理论（Institutionalist Segmentation Theories）下，依据劳动力市场类型及职业教育监管的主导地位不同，划分成面向职业劳动力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以及兼顾两种市场的三类技能形成模式，分别以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为代表。[17]此外，技能形成模式类型划分还可从技能培训空间（Skill Training Space）、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等维度展开。不同的划分维度为全面理解技能形成模式提供了丰富的视角。

依据现有研究，在众多技能形成模式类型划分中，国家及企业卷入技能形成的程度是类型划分的主要依据，二者的权力配比不仅决定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治理制度，更构成了技能形成模式的本质区别。[18]遵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理念，即“为了使概念上清晰明朗，突出最为一致的特征”，[19]本文综合沃尔夫-迪特里希·格雷纳特（Wolf-Dietrich Greinert）[20]、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21]、马里乌斯·布塞迈耶（Marius Busemeyer）等[22]以及王星[23]等学者划分技能形成类型的分类逻辑，同时参考欧盟职业培训发展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Training，Cedefop）在研究技能投资回报率中对各国家的类型划分，[24]将技能形成模式划分为四大类型，并选取丹麦、波兰、法国、爱尔兰作为典型研究对象，筛选出了技能形成的四种类型（参见表1）。

本文选取欧盟上述四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依据在于，从技能形成模式覆盖的完整性上看，以“国家卷入”和“企业卷入”程度为坐标轴系，覆盖了职业教育构建中“国家-企业”两大核心主体的角色组合（其他如职业学校、行会、工会等主体多是在国家政府及企业两个主体的组合），其中丹麦代表集体主义模式（强国家+强企业）、波兰代表分隔主义模式（强企业+弱国家）、法国代表国家主义模式（弱企业+强国家）、爱尔兰代表市场主义模式（弱国家+弱企业），这一类划分充分体现了“国家-企业”的互动特征，为职业教育治理结构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分析工具。就地域的代表性而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表1 国家技能形成模式的类型表

资本政治		国家卷入	
		强	弱
企业卷入	强	集体主义(丹麦)	分隔主义(波兰)
	弱	国家主义(法国)	市场主义(爱尔兰)

言,四国同属欧盟,共享制度基础,却在工业化路径与社会治理传统上差异显著。丹麦作为北欧国家,以社会伙伴关系和高福利模式为特征,体现国家与企业的深度协同;波兰作为中东欧后发转型经济体,凸显市场驱动下企业自主性的崛起;法国作为大陆法系代表,延续国家干预传统,形成强政府规划型治理模式;爱尔兰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依赖市场效率实现技能与资本的高效匹配。选择这四个国家遵循制度共性下的多样性最小充分集合,便于聚焦国家与企业角色对职业教育构建的直接影响。同时在"巴尼时代"挑战下,面对技术颠覆与职业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四国技能形成模式展现出不同的韧性。通过对四国技能形成模式的比较研究,其治理经验与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目标较为契合,可映射到我国政策实践中,为构建中国特色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体系提供参照。

(二)技能形成模式的分析框架

探讨技能形成模式,本质是探究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制度如何协同塑造个体技能发展路径。不同主体的研究视角为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提供了多维参照。从教育系统看,职业教育的使命是解决技能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匹配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如何吸引劳动者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教育学对技能形成的研究,聚焦劳动者个体的心智转换,即阐释个体如何获取和运用知识以形成技能。从劳动力市场看,职业教育是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载体。企业通过参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员工培训等实践,将技能形成转化为生产力提升的投资策略,[25]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重要功能。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并不在职业教育本身,而在于社会的薪酬制度。[26]当前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等深层问题在于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回报未能与其贡献匹配,本质上源于社会阶层流动通道的不畅。因此,构建技能社会,需要以职业教育为枢纽,优先关注宏观问题解决,推动薪酬分配、社会保障、技能认证等制度向技能价值倾斜,重塑技能成才的社会基础,以此才能推动内部育人机制等的改革。

综上所述,四种技能形成模式主要受主体卷入程度的影响,通过主体权责的再分配,以及配合相关制度设计,分别取得了不同的社会后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据上述三个维度构建了具体的分析框架(参见图1),并围绕下述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27]首先,主体权责维度聚焦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与互动逻辑,决定了国家政府及企业的协同模式。该维度主要围绕两方面问题展开:其一,技能形成的控制权与话语权分配问题。在不同模式下,政府机构、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雇主及工会等利益集团分别承担何种角色?"巴尼时代"的技术变革对主体实际控制权产生了哪些影响?技能资格认证主导权和行业话语权的归属如何反映社会制度特征?其二,技能供给主体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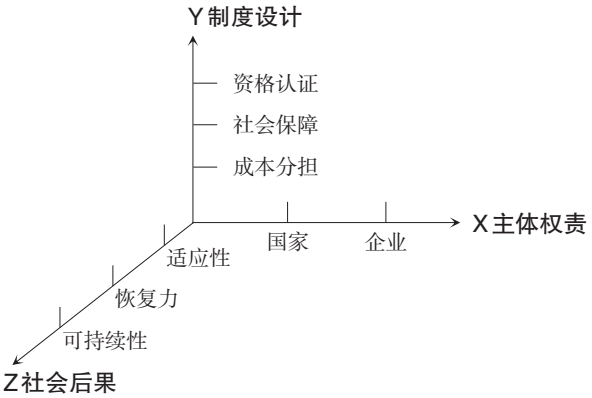

图1 技能形成模式的分析框架

协同制度问题。政府、企业等主体间的制度安排与协作模式,如何作用于技能形成过程并产生差异化结果?在“巴尼时代”背景下,技能供给主体的规模结构、组织形式、供给方式又将发生哪些适应性变化?其次,制度设计维度通过制度安排调节资源流动与利益分配,核心是构建可持续的成本分担体系,具体包括:采取哪种成本分担方式,涉及的成本类型,配套的社会保障措施又是什么,以及“巴尼时代”对成本分担制度灵活性和准确性又提出了哪些新要求,还有走出文凭社会后的技能资格认证体系如何构建。最后,社会后果维度作为协同成效的反馈制度,关注技能形成的系统性影响。不同技能形成模式对社会阶层流动、企业竞争力、劳动者个体发展将产生哪些效应?可能引发的影响将如何作用于个体,使其需要依赖适应性、恢复力、可持续性等韧性特质应对变局?这些后果预期为政策优化提供了现实依据。此外,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着协同作用,共同调节着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体系的走向。综上所述,职业教育作为技能形成的核心枢纽,其价值实现依赖于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社会制度在主体权责界定、制度设计创新、后果反馈优化中的动态协同。唯有突破单一领域局限,在系统性分析框架基础上,才能推动技能形成从个体能力提升向社会形态转型的深层跃迁。

三、巴尼时代下的欧盟国家技能形成模式探析

在技能社会构建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因国家制度、市场结构与利益集团的博弈差异,形成了多元技能形成模式,而依据主体权责配置与制度设计逻辑的差异,可将其归纳为集体主义、分隔主义、国家主义与市场主义四种类型。以丹麦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模式,通过政府、企业、工会等利益集团的深度合作,构建起权责清晰的协同网络;波兰的分隔主义模式则以大型企业内部封闭培训为主导,凸显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特性;法国的国家主义模式强调政府在制度供给与资源分配中的核心地位;爱尔兰的市场主义模式则充分释放企业在技能培训中的自主性。这些模式的差异化演进,既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又是新时代下适应性调整的过程。

（一）丹麦集体主义技能形成模式的历史演进及调整

1.丹麦集体主义技能形成模式的历史演进

丹麦的技能形成模式历经行业垄断和国家接管两个阶段，形成了以职业学校为主、学徒制为辅的双元制，该模式下的技能具有高度可认证性与产业内可携带性的特点。19世纪中叶，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生产活动迫使丹麦手工学徒制转型，企业为了能够主导技能形成过程，创建了区域合作网络。1862年，丹麦政府在《企业法》（*Enterprise Act*）中下令废除部分传统手工艺组织，但残余的行会组织为新兴的工会及雇主组织提供了劳动力市场联合监管的范例，形成了社会合作伙伴。此外，为了抑制自由主义改革趋势，地方手工艺组织创办了职业学校，提供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培训，在社会合作伙伴的监督下，该形式逐渐制度化，获得了国家的认可。之后，行业组织越来越多，且对半熟练工人的技能培训尤为感兴趣，比如丹麦全国雇主联合会（Employers′ Confederation）要求各行业创办产业学校，使其成为技能形成的主要供给者，并主导技能资格认证等工作。

直至19世纪末，丹麦政府着手构建教育系统，国家方才介入技能形成过程。丹麦议会于1899年通过了第一个《学徒培训法》（*Apprenticeship Act of 1899*），对传统学徒合作提出新规定，随后又在1921年和1937年颁布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学徒培训法》，授予社会合作伙伴正式权力，承担职业培训工作，建立学徒理事会（Apprenticeship Council），负责监督管理技能形成过程。在此期间，丹麦政府先后出台了如《失业保险法》（*Unemployment Insurance Act*）、《技术教育国家监管法》（*Technical Education State Supervision Act*）、《坎斯勒加德协议》（*Kanslergade Agreement*）等文件，明确了社会合作伙伴在技能培训的成本分担及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职责。至此，丹麦在主体权责和制度设计下形成了由国家支持、社会合作伙伴共同主导技能形成过程的集体主义模式。

二战后，丹麦政府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体系，全面引入了学校制度。在职业教育方面，激进自由党主张将职业教育与理论知识结合起来，认为职业教育要贴近经济现实，应由国家承担技能培训成本，以及推行双元学徒制，但遭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到了20世纪70年代，学徒数量骤减。社会民主党掌权后，不再激进地推进以职业学校为供给主体的技能形成，转而支持双元制，给予了学徒制大量经济补贴，普遍提高了学徒工资，引入了雇主补偿计划，落实了征税及补助制度，并将学徒与企业绑定以防止挖人现象出现。[28]丹麦政府在技能形成过程中制定的成本分担制度和技能保障制度等的设计下，进一步巩固了集体主义模式的主体权责和制度设计，为后续改革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丹麦集体主义技能形成模式基本保持不变。直到1993年，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后，要求职业学校成为技能供给的主体，其目的是更好地发展双元制，以帮助学生在经济萧条时期获得学徒机会。2012年以后，丹麦各党派之间在技能形成问题上政策趋同，即基于职业学校主导双元制，旨在改进技能培训的产业内携带性及提高质量。政府出台了如《更好、更具吸引力的职业教育》（Bedre og mere at-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traktive erhvervsuddannelser）、《更好的教育和就业》（Bedre uddannelse og job）、《从小学到技术工人——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Fra folkeskole til faglært arbejdskraft-erhvervsuddannelser til fremtiden）等报告，[29]通过在职业学校内创建职业教育培训中心、开展学徒外展活动、制定学徒行动计划等举措，增加对职业教育的补助，拉动社会合作伙伴深度参与技能形成过程，初步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后果，从而持续深化集体主义技能形成模式。

2.“巴尼时代”丹麦技能形成模式的调整

面对技术变革与产业转型压力，丹麦通过主体权责再界定与制度设计创新，巩固集体主义模式的韧性（社会后果），实现了对技能形成的调整。就主体权责维度而言，丹麦政府力求重构多元主体协同网络，升级国家角色，深化社会合作伙伴关系。为应对“巴尼时代”的冲击，丹麦政府做足了准备。例如，在推出数字化转型及工业4.0战略前，便率先制定了教育技术行动计划，通过强化各级各类教育对技术的应用、深化对数字技能的理解，将相关要求纳入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实践等环节，提供全方位数字化服务等方式，提升丹麦国民应对数字化挑战的能力。[30]该计划为政府后续制定的《国家数字化战略2022-2026》（*National Strategy for Digitalization 2022-2026*）、《国家数字十年战略路线图》（*National Digital Decade Strategic Roadmap*）、《2025年数字增长战略》（*Digital Growth Strategy 2025*）等奠定了基础，促使职业学校及所有社会合作伙伴能够直面数字化转型，为平稳度过“巴尼时代”危机创造了条件。

与之相关的是，丹麦政府对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重新界定了技能供给主体在技能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规定职业学校理论教育约占三分之一课时，社会合作伙伴的实践培训约占三分之二课时，以确保劳动者掌握理论、实践和综合技能。为落实这一政策，丹麦成立了知识中心（Knowledge Centres）、职业教育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中心（Vocational Education ICT Application Center），开发了职业教育与培训大数据平台（VET Big Data Platform），发布了数字职业教育工具（Digital Vocational Education Tools），并制定了数字职业学校计划。这些新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在技能形成中的引领作用，明确了职业学校与社会合作伙伴在集体主义技能形成模式中的权责关系，通过引入数字技术监测技能形成的质量水平，确保劳动者有效获得所需技能。

在制度设计维度，丹麦政府频频推出改革举措，创新技能形成的成本分担、社会保障制度及技能资格认证。第一，从2020年起，丹麦政府就与社会合作伙伴签署了多项学徒制第三方协议，承诺为学徒制提供资金与激励措施，目标是使80%的劳动者拥有学徒制合同，确保多方主体在合法权益框架下参与技能形成过程。第二，面对“巴尼时代”的挑战，丹麦政府尤为关注低技能及失业劳动者的技能提升问题。为此，政府设立了基础教育和预备性培训机构（forberedende grunduddannelse），预留专项经费供市政当局实施相关计划，促进劳动者技能形成。另外，丹麦政府联合私营公司、行业组织、市政就业中心等利益相关方，构建了成人就业培训模式（JOB-VEU），通过区域教育基金支持和法律干预，扩大失业者接受技能培训的机会。[31]第三，丹麦政府致力于发挥职业教育的启蒙作用，修订了青年指导榜样计划，邀请学徒担任小学顾问或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辅导员，以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吸引力。第四，在技能资格认证方面，丹麦聚焦构建终身学习路径、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支撑绿色与数字化战略转型以及强化全球资格互认等，努力实现将劳动者个人发展、企业效能、国家竞争力及国际人才流动多主体目标的整合。

截至目前，丹麦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在职业学校与社会合作伙伴的协同下有序推进。通过调整成本分担、社会保障、资格认证等相关制度，政府确保了集体主义技能形成模式的稳定性，培育了相应的技能文化，使其能够以最小代价走出“巴尼时代”的“混沌”，其社会后果表现为对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追寻。

（二）波兰分隔主义技能形成模式的历史演进及调整

1.波兰分隔主义技能形成模式的历史演进

波兰的技能形成模式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历经二战及人民政权重建，至1961年波兰议会通过《发展教育法》（Rozwój systemu oświaty i wychowania），在几经改革后，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技能人才。1989年波兰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发展模式剧变，大批国有企业私有化；而加入欧盟前后，技能形成过程因未受政府重视，加之大量跨国公司引入加速了本国去技能化进程，导致波兰对技能形成的监管陷入“无政府状态”。[32]此后，企业、行业协会、财团等各类私营主体成为技能供给的主要力量。至此，波兰主要依赖企业内部各主体来推进技能形成，而各私营部门间的技术差异及权责关系差异，使技能分隔现象成为其职业教育的显著特征。这一状况持续到2010年，政府长期缺位与企业配合不足，迫使波兰启动职业教育体系改革。2009年6月，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与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通过法律确立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学分体系（ECVET），受此推动及影响，波兰政府允许学生通过学分累积获取职业文凭，进一步拓宽职业资格获取途径，并明确由区域考试委员会（Okręgowa Komisja Egzaminacyjna）负责劳动者技能资格认证。[33]但受限于波兰与欧盟的复杂关系及传统分隔主义技能形成模式，改革进展缓慢，长期未获得显著突破，依然维持原有的主体权责关系。

2016年，波兰企业发展局（Polish Agency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牵头成立技能规划委员会、行业技能委员会和人力资本研究所三类机构，主导本国技能形成进程。同年底，波兰在《学校教育法》（Prawo oświatowe）中明确要求教育部门履行公共职业教育职责，依据企业需求调整教育内容，承担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推进学历与职业资格证书衔接等任务。[34]在制度设计维度看，除企业自主出资外，《学校教育任务融资法》（Finansowaniu zadań oświatowych）规定企业雇主可使用国家培训基金开展员工技能培训。[35]此外，波兰政府积极借助“伊拉斯谟+”项目、欧洲区域发展基金等欧盟资源，助推技能形成体系建设。总体来看，在波兰技能形成模式中，企业的主导性尤为突出，并承担着相关技能形成制度设计的任务与责任。

近年来，波兰政府频繁推进职业教育改革，2017年出台《责任发展战略》（Strategia na rzecz Odpowiedzialnego Rozwoju），2019年发布《2030年综合技能战略》（Zintegrowana Strategia Umiejętności 2030）及《2030年人力资本开发战略》（Strategia Rozwoju Kapi-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tału Ludzkiego 2030）等，试图通过重塑技能形成过程以实现良好社会效应。但受历史因素影响，企业长期主导波兰技能形成，随着政府干预力度增强、介入程度加深，其技能形成模式正处于持续转型之中。

2.“巴尼时代”波兰技能形成模式的调整

“巴尼时代”给波兰带来诸多挑战，迫使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改革举措愈发频繁，核心方向是推进数字化转型。例如，波兰设立未来产业平台基金会，旨在依托企业、行业协会、工会等利益相关方，整合资源并联合职业教育机构，共同培养数字化人才以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又如波兰劳动力市场预测系统项目，借助数字技术精准分析劳动力市场需求与职业教育供给，促进产教对接并引导政府合理配置资源。此外，波兰政府还开展了数字学徒制探索。[36]这些措施显示，波兰政府试图在技能形成中强化引领作用，承担起主体权责，但在成本分担、社会保障、资格认证等制度设计维度上的改革步伐较小，仍延续着分隔主义的技能形成模式。

然而，波兰政府意识到，仅凭现有技能形成模式难以应对“巴尼时代”的冲击，技能形成的主导权不能仅仅由企业掌握。因此，政府在《2023年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简报——波兰》（*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Briefs 2023-Poland*）中明确提出，技能供给主体需实现多元化：教育部应主导技能形成进程，其他部委协同配合，推动相关行业企业与职业学校开展深度合作；职业学校需依据劳动力市场需求培养技能人才；企业组织需提供工作本位学习机会、推进学徒制、参与职业资格认定并开发综合资格系统；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合作伙伴也需在技能形成中发挥协同作用。[37]

相应地，政府逐步加强对技能形成过程的调控，并设计相应制度使其运行起来。例如，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在正规教育系统中，中央考试委员会（Centralna Komisja Egzaminacyjna）和区域考试委员会负责教育系统内的技能认证，职业学校拥有初级资格授予权；在非正规教育系统中，继续教育中心（Centrum Kształcenia Ustawicznego）、职业培训中心（Zakład Doskonalenia Zawodowego）、行业技能中心（Sectoral Skills Centres）、波兰手工业协会（Polish Craft Association）等机构可在符合国家标准与程序的前提下实施技能认证；企业、工会、行业组织则承担技能认证的监督职责以保障质量。[38]在成本分担方面，由于国家及地方政府预算有限，波兰依赖世界银行（WB）、欧洲结构和投资基金（ESF）等国际组织资助。社会保障领域，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专项福利为特殊群体和失业人员提供保障；企业则负责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退休金等制度性保障。通过政府与利益相关方的频繁协作，波兰致力于保障各群体在技能形成中的权益，推进劳工阶层在技能获得、职业发展机会上的平等化，缓和劳资关系，增强抵御内外部冲击的韧性。

不过，波兰当前对技能形成模式的调整，并未取得较好的社会后果。尽管波兰政府与国际组织频繁互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工阶层在技能获取和职业发展机会上的平等化，缓解了劳资矛盾，但成本分担中企业和个人负担较重，且企业与政府在技能形成过程中的权责关系依然不明确，导致分隔主义模式下的技能分隔现象依旧存在，不同企业、行业间的技能通用性不足。因此，波兰仍需快速适应“巴尼时代”的变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化，推进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以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三）法国国家主义技能形成模式的历史演进及调整

1.法国国家主义技能形成模式的历史演进

法国技能形成模式的发展，本质是国家通过法律与政策持续强化主导权的构建过程。具体而言，法国的技能形成模式起源于中世纪的行会学徒制，其中手工业行会在技能传承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及行会制度的腐败，传统学徒制逐渐式微，国家开始强化对技能形成的干预，并承担主体权责。法国政府通过颁布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职业教育，如1919年的《阿斯蒂埃法案》（la loi Astier）、1971年的《德罗尔法案》（la loi Delors）、1983年的《权力下放法案》（le droit de la décentralisation）等，并于1961年与雇主组织、工会组织签订内部协议，建立学徒培训中心（centre de formation d′apprentis）。由此可见，法国由政府主导技能形成过程，完成了向现代学徒制的转型，初步构建起政府主导的国家主义技能形成模式。

进入21世纪，法国政府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现代化法案》（loi de modernisation sociale），明确职业学校与企业在技能供给中的职责分工，即推进理论教学与实训实践的衔接，赋予职业学校与企业更多自主权，共同开发培训课程、共享资源以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权益保障与经费制度，细化劳动时长、社会保障、工资标准等内容，完善学徒培训税改革，确立以国家为主体、学徒培训中心协调的成本分担制度。同时要求在多元主体框架下健全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同等资格认证制度、普职融通制度及技能认证标准与质量保障制度，以提升技能培训吸引力，推动国家累积性创新。[39]在此法案框架下，法国延续国家主义模式深化发展，并进一步完善了制度设计，职业教育公共属性凸显，侧重通用技能培养，其标准化特征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此后，法国政府陆续颁布2014-288号、2016-1088号、2018-771号法令，强化学徒培训中心职能，成立法国技能署（France compétences）统筹技能管理；明确地区政府在技能形成中的角色，简化校企合作行政程序，允许公共机构、私营部门等多元主体参与，扩大技能供给主体范围；增加资金投入，在学徒培训税基础上开征附加税，要求政府与企业签订法定培训协议、共担成本并开发综合方案，以保障各方权益、激活主体积极性。[40]这些举措表明，面对技能形成中的挑战，法国通过持续简政放权，赋予职业学校与企业更多主导权，以提升技能培养质量。总体而言，法国政府凭借强有力的政策、法律与计划，在技能形成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推动国家技能体系持续演进。

2.巴尼时代法国技能形成模式的调整

在“巴尼时代”的冲击下，法国经济严重衰退，劳动力市场遭受重创，失业率持续攀升，社会不稳定性加剧，且在数字化、绿色化等领域的发展优势不足。多重危机渗透至利益集团内部，企业组织生存承压，职业学校亦受波及，为此法国政府（大区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技能形成的主导权。一方面，政府通过国家担保向企业提供贷款，助力企业维持运营，确保其持续参与技能形成过程；[41]另一方面，推出青年就业援助计划、部分失业计划、再动员培训等紧急措施，同步推进职业学校改革，强调关注劳动者技能思维培养，重构技能供给关系，开启了以技能思维培育及供给关系重构为核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心的新阶段的技能文化建设。

具体来看，在主体权责维度，法国政府基于社会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职业高中改革》（Réformer les lycées professionnels）报告、《国民教育财政法案》（Le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l'éducation nationale）及修订《劳动法》（Code du travail）等方式，收紧了对技能形成的控制权，试图引领职业学校、企业、雇主和工会等主体突破"混沌"，重塑技能社会的结构与秩序。在此过程中，政府机构主导政策话语权，具体行使修订职业教育文凭、更新现有资质、提升职业文凭获得率、强化就业支持、扩大职业教育比例等权力。[42]作为技能供给体系的核心设计者，政府要求在职业高中设立企业办公室，由校企共同运营以提供专业职业指导，并开发Orion、InserJeunes等数字平台，推动多元主体深度参与技能形成。

就制度设计维度而言，法国政府分担大多数成本，且显著增加财政投入，预计2025年投入5.74亿欧元用于新培训计划，重点加大对特殊群体的援助、企业补贴及就业服务机构资助。[43]在社会保障领域，政府在完善职业教育认证制度的同时，同步深化失业救济金、失业保障、工伤保险、养老金、退休人员再就业培训支持、家庭补贴及工作家庭平衡支持等制度改革，多维度增强劳动者抗风险能力。[44]在技能资格认证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各主体的权责，强化现有技能资格认证体系，并在探讨数字化及微证书的可行性，试图增加现有技能资格认证体系的灵活性。针对法国技能形成模式调整后的社会后果而言，法国旨在提升劳动者就业竞争力、满足企业高端用人需求、促进社会公平与融合、推动经济创新与产业升级、构建可持续发展路径。这一系列以"韧性构建"为核心的举措，目的是通过重塑技能文化，引领法国迈向技能社会，有效应对"巴尼时代"的挑战。但依然面临着过度依赖政府财政补贴等问题，导致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缓慢，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爱尔兰市场主义技能形成模式的历史演进及调整

1.爱尔兰市场主义技能形成模式的历史演进

爱尔兰的技能形成模式深受11世纪行会制度影响，传统手工艺组织通过制定技艺标准与规范，以师徒世袭或作坊寄养的方式培养技能人才。严格的培训流程与监督管理制度保障了学徒质量，也巩固了行会组织在技能传承中的核心地位。直至19世纪末，爱尔兰政府启动现代教育体系建设，职业教育迎来重要转型。1899年《农业和技术指导法案》（*Agriculture and Technical Instruction Act*）引入正规学徒制，强调职业培训须与岗位实践结合；1930年《职业教育法》（*Vocational Education Act*）要求设立职业教育委员会统筹全国职业教育事务，但因未强制雇主参与，学徒制仍停留在临时性阶段；1931年与1959年，政府两次颁布《学徒制法案》（*Apprenticeship Act*）尝试改革，却因政策连贯性不足且缺乏对企业的刚性约束，国家整体技能水平长期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

在市场主导型技能模式下，企业间的挖人竞争削弱了其参与技能培养的积极性，难以满足国家发展需求。1967年《工业培训法案》（*Industrial Training Act*）首次明确政府干预角色，规定企业在技能形成中的法定职责。20世纪70年代初，大量跨国企业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涌入，带动技能培训投入，培养了大批熟练与半熟练劳动力。但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下，政府无暇顾及职业教育的投入，企业削减培训预算，技能形成过程再次被市场力量主导，这一状态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工业化转型，1993年《劳动服务法》(*Labour Services Act*)要求为长期失业者和辍学青年提供技能再培训，并成立国家培训机构培训与就业局(FáS)，作为连接社会合作伙伴的第三方协调机构。2000年《终身学习：成人教育白皮书》(*Learning for Life: White Paper on Adult Education*)发布，标志着政府开始关注成人技能提升。此阶段政府话语权仍较弱，企业主导技能供给，成本分担与社会保障等制度设计也均由市场主体决定，强化了企业对技能形成过程的控制，却使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其社会后果也显而易见，2008年金融危机动摇了企业主导的技能形成体系。2013年，教育和技能部启动职业教育体系审查，同年《继续教育和培训法》(*Furt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t*)设立继续教育与技能服务局(SOLAS)及企业主导的学徒委员会，构建多方协同制度。2016年引入财团参与技能供给，次年推出代际学徒制项目，进一步丰富供给主体。技能资格认证方面，两类并行体系均需经爱尔兰质量与资格认证局(Quality and Qualifications Ireland)认可；成本分担上，国家培训基金加大投入，2019年向职教系统注资1.42亿欧元。[45]但社会保障领域改革滞后，尚未形成实质性突破。总体而言，新改革通过国家强制性干预与社会合作伙伴自主权的结合，推动学徒规模持续扩大、多元主体深度参与，为市场主导型技能模式注入新活力。

2.“巴尼时代”爱尔兰技能形成模式的调整

在“巴尼时代”的冲击下，爱尔兰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市场主导型技能形成模式推动职业教育体系同步向数字技能领域深度演进。作为国家层面的关键举措，爱尔兰信息与通信技术技能网(ICT Skillnet Ireland)自成立以来，已为超5 000家企业及1.2万名专业人员提供数字化技能培训与指导。[46]这一行动不仅为《国家数字十年战略路线图》(*National Digital Decade Strategic Roadmap*)奠定了实践基础，更催生了《到2027年的学校数字化战略》(*Digital Strategy for Schools to 2027*)等规划的出台，助力爱尔兰占据数字化转型先机，缓解经济社会的混乱与不稳定。

爱尔兰政府敏锐地捕捉到国民在“巴尼时代”面临的脆弱性、焦虑感等挑战，因此重新调整政府与企业的主体权责，推进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爱尔兰政府发布《国家技能战略》(*National Skills Strategy*)，强制要求企业雇主深度参与技能形成过程，为全体国民提供适配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技能培训。[47]紧接着推出的《国家就业战略》(*National Employment Strategy*)，以经济复苏计划为依托，通过工作学习体验计划、个性化就业指导、基本收入保障、薪酬补助减免及远程工作支持等多元措施，目标是到2024年实现250万人就业，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48]而在学徒制改革中，政府推出《学徒制行动计划》(*Action Plan for Apprenticeship*)，成立国家学徒制办公室(National Apprenticeship Office)，聚焦中小企业与多行业领域，通过经济补助与制度设计扩大学徒规模，保障不同群体的公平参与。[49]这些政策“组合拳”标志着国家对技能形成的介入程度显著加深，正引导企业等主体重塑技能供给体系。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爱尔兰技能形成过程中最具创新性的调整制度是推进微证书（资格认证制度）的落地。在《国家资格框架》（*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中纳入专门用途证书，允许学分累积兑换完整资质，并推出在线微证书体系，惠及劳动者、职业学校、企业雇主及认证机构等多元主体。国家资格认证机构与传统行会组织共同负责技能认证，赋予劳动者依据职业变化灵活选择技能提升路径的自主权，从而有效应对“巴尼时代”的非线性挑战。在成本分担制度方面，2018-2023年间，爱尔兰政府累计投入6.2亿欧元用于学徒制建设，另有约6 700万欧元注入经济复苏相关技能项目。[50]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上，在原有措施基础上，国家学徒制办公室特别强调对女性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推动性别平等在技能培训中的落实。

由此形成的社会后果而言，爱尔兰仍然遵循市场主义技能形成模式，围绕企业构建了福利制度、治理制度、社会保护制度和资格认证制度等，同时企业也是技能供给和技能认证的主体之一，但国家参与该过程的程度持续加深，并在多个领域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形成独具爱尔兰特色的技能文化，为走出“巴尼时代”的陷阱，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适应性创造了条件。

四、巴尼时代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路径

从国家比较视野考察，丹麦集体主义、波兰分隔主义、法国国家主义和爱尔兰市场主义四种技能形成模式，在技能供给、成本分担、社会保障及资格认证等主体权责和制度设计等维度呈现显著差异，其政策部署也引发了不同社会后果。进入“巴尼时代”，这些模式显现出趋同特征：一方面体现为国家对技能形成的干预强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工会、行会等多元利益集团的协同参与，且围绕技能形成的核心议题渐趋一致。“巴尼时代”的特殊性催生了独特的技能文化，需要率先解决受时代影响的宏观问题，以此为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路径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构建国家适度管控的技能形成新型生态格局

在“巴尼时代”背景下，包括数字化在内的多重挑战，不仅改变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引发了政府、劳动者、雇主等多元主体的内部焦虑。以往稳固的技能形成模式面临冲击，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主体来推动技能形成结构与秩序的重构。显然，国家政府凭借其强大的资源整合与汲取能力，能够直接介入技能形成过程，或通过颁布法律法规、制定项目计划等方式进行间接指导，从而增强技能形成的韧性，为构建可持续性发展的技能社会奠定基础。

对比丹麦、波兰、法国和爱尔兰四种不同的技能形成模式，即便在原本政府卷入程度相对较低的分隔主义和市场主义模式中，当前国家干预的手段和途径也在不断增多。国家通过加强对技能形成的控制，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以稳步迈向技能社会。例如，波兰作为实行分隔主义技能形成模式的国家，政府频繁对职业教育体系进行改革，积极推进技能资格认证、成本分担、社会保护等制度的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政府并未采取“一刀切”的强硬方式，而是为社会合作伙伴预留了较大的操作空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间，以实现政策灵活性与有效性的平衡。而对于法国这种秉持国家主义技能形成模式的国家，主要通过出台法律和法案来规范技能形成过程，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增强技能社会的韧性，抵御时代变化带来的冲击。

综上所述，在“巴尼时代”的深刻影响下，不同技能形成模式的国家都遵循着国家政府引领技能社会的理念，致力于构建国家适度管控的技能形成新型生态格局。这里的“适度管控”，一方面，意味着国家在关键领域和重大问题上要发挥主导作用，如制定宏观政策、保障基础资源投入等；另一方面，要给予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足够的自主空间，激发其创新活力与积极性。国家应依据技能形成的实际需求和不同阶段的特点，动态调整管控力度，确保技能形成过程既有序又充满活力。

（二）塑造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技能供给长效制度

在“巴尼时代”，技能被赋予了全新的规范与准则。跨界整合的技能成为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础与支撑，这要求技能人才具备复合型知识储备、跨界融合能力和反思创新精神等核心素养，能够运用互联网技术提升自身综合素质、解决实际技术难题，并协调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然而，文凭社会建构下的技能形成模式，无法直接体现劳动者的真实技能素养。因此，丹麦的集体主义、波兰的分隔主义、法国的国家主义、爱尔兰的市场主义等技能形成过程，纷纷面向数字化制定了相关战略。

各国从多个维度加强与企业、行业、工会、财团等社会合作伙伴的交流与融合，使其成为技能供给的重要主体。职业学校在技能供给适配性和构建技能形成社会吸引力方面，也作出了均衡的策略抉择。其核心目的在于塑造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技能供给长效制度，通过内部主体的紧密合作，有效抵御外部冲击。以丹麦为例，该国调整了职业教育教学时长，将三分之二的时间分配给社会合作伙伴，并签订了多项学徒制第三方合同，预留大量基金用于承担培训成本。爱尔兰则成立了国家学徒制办公室以及继续教育和技能服务局，通过制定一系列举措，为社会合作伙伴提供充分的保障。即便是波兰，政府也在积极向企业渗透多元主体合作意识。在“巴尼时代”，多元主体需要协同联动，打破文凭社会的限制，深度参与到职业教育的技能供给中。这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沟通协调制度，例如定期召开多方参与的技能供给研讨会，共同制定技能培养目标与课程体系；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实现企业实践资源与学校教学资源的互通有无；建立激励制度，对在技能供给中表现突出的主体给予表彰和奖励。通过这些方式，形成技能供给的长效制度，共同推动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

（三）健全国家本位政策导向的技能形成制度设计

通常而言，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一国的技能形成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需要构建一整套制度安排，涵盖培训风险承担、技能标准化和资格认证程序、职业学位系统的分层与差异化、培训主体角色安排，以及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的关联等方面。[51]西方发达国家如丹麦、波兰、法国、爱尔兰等，在其技能形成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均完成了这一制度建设工作。以法国为例，自21世纪以来，法国就着手构建权益保障和经费制度、技能资格认证制度、同等资格认证制度、普职融通制度等，并不断完善成本分担和社会保障制度。然而，在“巴尼时代”这种混乱且不稳定的局势下，企业等主体的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存面临严峻考验,更难以有效实施与技能形成密切相关的成本分担、社会保障和资格认证制度。为了重构技能形成的结构与秩序,政府必须发挥强有力的调控功能。法国政府向企业等主体投入数亿欧元补贴,开展新的培训计划,承担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主要费用,同时进一步完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一特殊阶段,为摆脱中断与混乱的局面,丹麦、波兰、法国和爱尔兰的政府积极参与技能形成的成本分担、社会保障和资格认证制度设计。政府应依据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成本分担政策,如对小微企业给予更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其参与技能培训。在社会保障方面,要扩大保障范围,将更多灵活就业的技能人才纳入其中,提高保障水平。在资格认证方面,通过增加微证书等更灵活的认证方式、推进数字化技能资格认证落地,加强国际资格认证体系互认等,确保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的质量。上述举措在于重新构建起稳定的技能形成结构与秩序,健全国家本位政策导向的成本分担、社会保障和资格认证制度,助力各国走出巴尼时代"混沌"。

(四)营造以尊崇技能为核心要义的技能文化体系

不同技能形成模式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存在差异,但"巴尼时代"使得这些模式的差异逐渐缩小。丹麦注重市场自治与国家干预的平衡,通过调整及更新成本分担、社会保障和资格认证制度,形成稳定的技能文化,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确保集体主义技能形成模式能够支撑国家的高效运转。波兰频繁推进职业教育体系改革,旨在将原本由企业、行业、工会等主体掌握的主导权部分收回,保证所有群体在分隔主义技能形成模式中都能获益,构建平等化程度较高的技能文化体系,不断增强职业教育的韧性。法国凭借国家主义技能形成模式,拥有社会平等程度较高的劳工阶层。政府通过颁布政策、出台法令,推动不同利益群体与职业学校的合作,基于信任构建技能文化,努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技能社会。爱尔兰为解决企业随意挖人行为以及参与技能形成过程动力不足的问题,政府在保障各个主体权益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主义技能形成模式的引领,致力于形成特色鲜明的技能文化,实现迈向技能社会的目标。在"巴尼时代",各国需警惕文凭证书的"滥用",转而聚焦技能及其本质。要通过加强宣传引导,树立技能人才的榜样,举办技能竞赛等活动,营造全社会尊崇技能的良好氛围。同时,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优化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使其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提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吸引更多人投身技能学习与培养。形成国家适度管控、政府参与构建技能形成制度、多元主体协同联动的技能文化体系,最终达成迈向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建设目标。

五、结语

在"巴尼时代",构建技能社会已然成为亟待深入探讨与推进的核心议题。技能社会致力于突破文凭社会的局限,本质上是技能形成体系的社会化过程。通过对丹麦、波兰、法国、爱尔兰这四个国家的四种不同技能形成模式进行深入考察,可以发现,技能社会的职业教育构建路径呈现出国家干预力度增强、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等典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型趋同性特征。这些国家的经验对于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启示价值。

第一,强化政府在技能形成中的统筹规划与管控能力。当前,我国在技能形成工作中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资源分配不均衡、部分领域管控力度与方式尚待优化等问题依然存在。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政策制定的引领作用。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系统地规划技能人才培养战略。在资源配置方面,应合理调配各类资源,加大对职业教育基础资源的投入力度,扩大投入规模,在关键环节与核心领域切实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为企业、行业组织等社会主体预留充足的创新空间,激发市场活力,以此构建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技能生态环境。

第二,大力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技能供给模式。我国在多元主体参与技能供给的实践中,虽已迈出坚实步伐,但仍存在参与深度与广度不足等问题。因此,应积极借鉴国际上成熟的多元主体参与技能供给经验,进一步深化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层次,通过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开发课程等方式,实现双方资源的深度融合与优势互补。此外,构建行业组织广泛参与的技能标准制定与资格认证制度,充分发挥工会在维护技能人才合法权益、促进技能提升方面的独特作用,进而形成协同高效、联动发展的技能供给长效制度。

第三,持续完善成本分担、社会保障及资格认证制度。政府应依据企业规模、行业特性等因素,制定差异化、精细化的成本分担政策。以制造业小微企业为例,可通过设立专项补贴基金等方式,对其技能培训活动给予有力支持。在社会保障层面,我国应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新业态技能人才全面纳入保障范畴,通过提升保障水平、优化保障制度等措施,为技能形成的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在技能资格认定方面,应构建更加灵活且高质量国家资格框架,保障技能人才的“含金量”。

第四,积极培育全社会尊崇技能的文化氛围。我国可通过广泛宣传优秀技能人才的先进事迹,举办高规格、专业化的技能大赛等多样化途径,显著提升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与职业待遇。同时,在职业教育领域,应基于市场需求导向,系统优化职业教育课程设置,增强职业教育的针对性与吸引力,营造全社会尊崇技能、崇尚创新的浓厚文化环境,为技能社会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文化驱动力。

[参考文献]

[1] Cascio, J.. BANI and Chaos[EB/OL].[2024-12-12].https://ageofbani.com/2022/04/bani-and-chaos/.

[2]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构筑人才基业——BANI时代下的企业破局之道[EB/OL].[2024-12-13].https://www.mckinsey.com.cn/构筑人才基业-bani时代下的企业破局之道/.

[3] 周敏,郅慧,滕文强.从“乌卡时代”到“巴尼时代”:国际传播韧性机制构建的三重进路[J].新闻与写作,2024,(6):59-68.

[4][27] 王星.从技能经济学到技能社会学:技能形成研究的多元面向[J].社会学评论,2022,(4):33-53.

[5] 徐国庆.“中国技能型社会建设”专刊编者按语[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4):5-8.

[6] [美]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M].刘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36-37.

[7] Grootaert,C..Returns to Formal and Inform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ote d'Ivoire: The Rol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Labor Market[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90,9(4):309-319.

[8] Bennell,P. & Segerstrom,R..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Has the World Bank Got It Righ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1998,18(4):271-287.

[9] McGrath,S. & Yamada,S.. Skills for Development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Current and Emergent Trend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2023,102(5):1-9.

[10] ITU. Digital Skills Toolkit[R]. Geneva: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2018:Ⅲ.

[11] ILO. Skills Shortages and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Canada,China,Germany,India,Indonesia,Singapore and Thailand[EB/OL].[2024-12-17]. https://www.ilo.org/sites/default/files/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secto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5929.pdf.

[12] Walker,W.,Holling,S.,Carpenter,R.,et al.. Resilience,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J]. *Ecology and Society*,2004,9(2):5-12.

[13] 张弛,赵良伟,张磊.技能社会:技能形成体系的社会化建构路径[J].职业技术教育,2021,(13):6-11.

[14] 唐智彬,杨儒雅.论我国技能型社会的结构与运行机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6):11-21.

[15][28] 马凯慈,陈昊.政治制度、产业关系与职业教育的起源与发展——基于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3):2-19.

[16] Sung,J.,Turbin,J.,Ashton,D..Towards a Framework for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ational Systems of Skill Form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2000,4(1):8-25.

[17] Bosch,G.. Different National Skill Systems[M] // Buchanan,J.,Finegold,D.,Mayhew,K.,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kills and Training*.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424-443.

[18] Busemeyer,M..Asset Specificity,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 and the Variety of Skill Regimes in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J]. *Socio-Economic Review*,2009,7(3):375-406.

[19] 周雪光."差序格局":一个理想类型的建构与阐释[J].社会学研究,2024,(4):136-157.

[20] Greinert,D.. Marktmodell-Schulmodell-Duales System[J].Die Berufsbildende Schule,1988,40(3): 145-156.

[21] Crouch,C.. The Dilemmas of Vocational Training Policy[J]. *Policy Studies*,1992,13(4): 33-48.

[22] Busemeyer,M. & Trampusch,C..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3-38.

[23] 王星.技能形成、技能形成体制及其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展望[J].学术月刊,2021,(7):132-143.

[24] Cedefop. Investing in Skills Pays Off: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st of Low-skilled Adults in the EU[R].Luxembourg:Publications Office,2017:11-12.

[25][51] 杨钋,王星,刘云波."制造业2025"与技能短缺治理[C].中国教育财政政策咨询报告(补充版),2021:6,3.

[26] 徐蓓.换种思路看职业教育——专访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石伟平[N].解放日报,2022-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03-18(9).

[29] Trampusch, C.. Co-evolution of Skills and Welfare in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Denmark, the Netherlands and Switzerland[J]. *Europe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0, 16(3): 197-220.

[30] Dobbins, M. & Busemeyer, M.. Socio-economic Institutions,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Partisan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Denmark and Sweden[J]. *Socio-economic Review*, 2015, 13(2): 259-284.

[31] Cedefop.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 Future of Work: Denmark[EB/OL]. [2024-12-20]. https://cumulus. cedefop. europa. eu/files/vetelib/2020/vocational_education_training_future_work_Denmark_Cedefop_ReferNet.pdf.

[32] 白鸽,吕云震,冯琨舒.从"学术自治"到"混合治理":论波兰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转变——基于政策趋同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J].世界教育信息,2021,(8):42-48.

[33] Dębowski, H., Stęchły, W..Implementing ECVET Principles.Reforming Poland'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rough Learning Outcomes Based Curricula and Assessment[J].*Warsaw Forum of Economic Sociology*, 2015, 6(12): 57-88.

[34] SEJM.Prawo oświatowe[EB/OL].[2024-11-09].https://eli.gov.pl/eli/DU/2017/59/ogl/pol.

[35] SEJM.Finansowaniu zadańoświatowych[EB/OL].[2024-11-09].https://eli.gov.pl/eli/DU/2017/2203/ogl/pol.

[36] Cedefop.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 Future of Work: Poland[EB/OL].[2024-11-10]. https://www. cedefop. europa. eu/en/country-reports/voca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future-work-poland.

[37] Cedefop.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olicy Briefs 2023-Poland[EB/OL].[2024-11-10].https://www.cedefop.europa.eu/files/ti0524300enn.pdf.

[38] Cedefop.European Inventory on Validation of Non-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2023 Update: Poland[EB/OL].[2024-11-10].https://www.cedefop.europa.eu/files/ee_cr2023.pdf.

[39] Légifrance.loi de modernisation sociale[EB/OL].[2024-11-01].https://www.legifrance.gouv.fr/jorf/id/JORFTEXT000000408905?isSuggest=true.

[40][45] Graf, L., Marques, M..Towards a European Model of 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 Analysing the European Alliance for Apprenticeships[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22, 38(4): 665-685.

[41] 李鸿涛,钱通.法国持续实施国家担保贷款机制[N].经济日报,2021-01-12(4).

[42] Académie de Versailles. Réformer les lycées professionnels : Faire du lycée professionnel un choix d'avenir pour les jeunes et les entreprises[EB/OL].[2024-11-03].https://voie-professionnelle.ac-versailles.fr/reformer-les-lycees-professionnels.

[43][44] Assemblée nationale. Projet annuel de performances Annexe au projet de loi de finances pour 2025 [EB/OL]. [2024-11-03]. https://www2. assemblee-nationale. fr/static/17/Annexes-DL/PLF-2025/Travail_emploi.pdf.

[46] Mirigliano, M..Technology Ireland ICT Skillnet[EB/OL].[2024-11-19].https://digital-skills-jobs.europa.eu/en/inspiration/good-practices/technology-ireland-ict-skillnet.

[47] Department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Science. Ireland's National Skills Strategy[EB/OL].[2024-11-19].https://www.gov.ie/en/publication/69fd2-irelands-national-skills-strategy-2025-irelands-future/.

[48] Department of Social Protection. Pathways to Work Strategy 2021-2025[EB/OL].[2024-11-19].https://www.gov.ie/en/publication/1feaf-pathways-to-work-2021/.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49] Department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Science. Action Plan for Apprenticeship [EB/OL]. [2024-11-19]. https://www. gov. ie/en/publication/0879f-action-plan-for-apprenticeship-2021-2025/.

[50] Cedefop. Implementing European Priorities in VET: Making National VET Agile, Flexible, Innovative, Attractive, Inclusive and Quality-assured: Ireland [EB/OL]. [2024-11-19]. https://www.cedefop.europa.eu/files/implementing_eu_priorities_ireland_2024.pdf.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Skills Society of the BANI Er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kill Formation Models in Four EU Countries

XIU Na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In the "BANI Era", a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 skills socie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its progress towar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skills society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skills formation. As a socialization process in a skills society, skills formation mainly takes four forms: collectivism, separatism, statism, and marketism.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kills formation models in Denmark, Poland, France, and Ireland based on a framework of th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onstruction subjects,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se four models exhibi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However, in the "BANI Era", the different skills formation models show the same trend, that is, they all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 skills societ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ecological pattern of skills formation with moderate national control, the shaping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skills supply with the coordinated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improvement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for skills formation with a national policy orient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a skills culture system with the core focus on respecting skills. The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re that it can reconstruct the structure and order of a skills society in the "BANI Era"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by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and moderate control,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mproving cost-sharing, social security, and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systems, and cultivating a cultural atmosphere that respects skills.

Key Words: BANI Era; skills society; vocational education; skills formation model

[责任编辑:胡 义]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